

# 中國近代 經濟思想史

下 冊

趙 靖 易 夢 虹 主 編

中 華 書 局

# 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

下 冊

趙 靖 易夢虹主編

帝國主義對中國展開大規模投資掠奪、資產  
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興起和  
失敗時期的經濟思想

中 華 書 局

1966年·北京

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

下 冊

趙 靖 易夢虹主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17號

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 毫米·1/32·5 3/4 印張·123,000 字

1966年2月第1版

1965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1—3,800 定價：(7) 0.60 元

統一書號：K 11018·603 65.12.京型

# 目 錄

引言 .....	1
第一章 清末大買辦官僚盛宣懷的經濟思想 .....	19
第一節 盛宣懷——清朝廷出賣路礦權利的主要經手人 .....	19
第二節 盛宣懷爲出賣路礦權利辯護的主要論點 .....	24
第二章 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首要代表人物孫中山 的經濟思想 .....	35
第一節 孫中山——近代中國偉大的革命先行者 .....	35
第二節 孫中山經濟思想發展的三個主要階段 .....	39
第三節 民生主義學說的主要特點 .....	48
第四節 孫中山論土地制度問題 .....	53
第五節 孫中山對資本問題的認識和態度 .....	64
第六節 孫中山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認識 .....	71
第七節 孫中山經濟思想的歷史意義和局限性 .....	80
第三章 資產階級革命陣營中其他代表人物的經濟思 想(上) 章炳麟 .....	85
第一節 資產階級革命陣營內各派人物在經濟思想上的分歧 .....	85
第二節 章炳麟 .....	87
第四章 資產階級革命陣營中其他代表人物的經濟思 想(下) 朱執信 .....	101
第一節 朱執信——孫中山民生主義學說的主要宣傳者 .....	101



## 引 言

從1901年辛丑和約訂立後開始，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為止，是中國近代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經濟思想發展的最後階段。在這一時期，統治集團中頑固派和洋務派在經濟思想上的爭論，已經完全消泯，為清朝廷出賣國家利權的政策和活動辯護的買辦官僚的經濟觀點，成了統治階級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資產階級的經濟思想則迅速分解為互相對立的兩派：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經濟思想和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經濟思想。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經濟思想也還包括着一些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要求；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和清朝廷的賣國政策嚴重侵害到它所代表的社會階層的利益時，它也還間或發出某些微弱的不滿和抗議的聲調。但是，它的鬥爭的主要矛頭已轉向資產階級革命派，就其基本的方面說，它已失去了在十九世紀末期曾經起過的那種進步作用，而轉化為一種為反革命政治勢力服務的反動思潮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經濟思想是這一時期中的主要的進步經濟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它曾對清朝廷的出賣國家利權的罪行作過相當的揭露和抨擊，又曾對資產階級改良派反對革命的經濟思想進行過激烈的鬥爭，從而為推翻清朝廷的辛亥革命準備了一定的思想前提。但是，由於革命派本身的弱點，革命陣營內部自始就在經濟思想上存在着嚴重的分歧；還在辛亥革命前，資產階級革命派

的經濟思想已開始呈現分裂和混亂；隨着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的失敗，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經濟思想也迅速趨於沒落。

統治階級經濟思想的更趨買辦化，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進一步勾結的反映。從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朝廷就開始走上了直接勾結外國侵略者、用出賣國家利權為代價換取外國侵略者的支持以維持其反動統治地位的道路。代表着這種趨向的洋務派，在清朝政權中的勢力和影響愈來愈大。到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後，清朝廷向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轉化的過程，就最終完成了。原來的洋務派買辦官僚固然更直接，更無恥地擔當起向帝國主義拍賣中國利權的經紀人的角色，頑固派人物也通過洋務派向帝國主義搖尾乞憐，整個統治集團都向帝國主義表示了完全的馴服。

清朝統治集團的徹底買辦化，從清末十年所實行的經濟政策中充分反映出來。在辛丑和約大綱開議後不久，清朝最高統治者就公開無恥地宣稱：今後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sup>①</sup>這是清朝統治集團決定按照帝國主義主子的要求，把中國的主權和經濟利益盡量奉獻給他們的賣國誓言。在這之後，清朝廷就在實行“新政”的名義下制訂了一系列的“結與國之歡心”的經濟政策，更加肆無忌憚地開展了大規模拍賣中國利權的活動。

1902—1904年，依照辛丑和約有關條款的規定，清政府先後同美、英、日等國改訂了通商航海條約。接着，又在《商標註冊暫擬章程》、《重訂鐵路簡明章程》、《重訂礦務暫行章程》等政策

<sup>①</sup>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四百七十七，頁十三。

文件中，對保護外國商標和外國人在築路、開礦方面的投資，都作了明文規定，以便利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各方面的經濟侵略活動，特別是資本輸出。

向帝國主義資本集團出賣在華築路、開礦權利，是清朝廷出賣國家利權活動的主要內容。奪取築路、開礦權利，在帝國主義掠奪殖民地的活動中佔着特別重要的地位。帝國主義壟斷資本集團，爲了在殖民地擴大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更大規模地掠奪原料以及對殖民地加強軍事、政治控制，都力圖攘奪築路權利。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在當時條件下，“鐵路是資本主義工業的最主要的部門即煤炭和鋼鐵工業的總結”，是帝國主義“壓迫附屬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裏佔世界人口半數以上的十億民衆和‘文明’國裏資本的僱傭奴隸的工具”<sup>①</sup>。在1895—1900年，清朝廷就已在中外合辦、外人承辦和鐵路借款等名義下，把包含中東、津浦、蘆漢等重要幹線在內的里程達九千里以上的鐵路修築權奉獻給外國資本集團。在實行“新政”後，更大規模地展開了出賣路權的活動，在1901—1911年之間，外國在華鐵路投資激增至251,289,142.69庫平兩<sup>②</sup>，較1894—1900年約增二倍半。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更企圖在鐵路幹線國有的藉口下，實行更全面的賣路政策，特別是要奪取商辦鐵路公司承修的川漢、粵漢兩路，把它們奉送給帝國主義。這一賣國政策立即激起了有廣大人民參加和支援的保路運動，成爲辛亥革命的直接導火線。

在殖民地附屬國攘奪礦山開採權，把儘可能多的原料來源

①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82頁。

② 徐義生編：《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中華書局，第90頁表。



控制在手中，對帝國主義壟斷集團的鞏固和加強有着重大的作用，“一旦所有原料的來源都掌握在某些人的手裏，這種壟斷同盟就鞏固無比了”<sup>①</sup>。帝國主義列強從 1895 年正式取得了在華投資辦工礦企業的特權之後，就瘋狂地展開了掠奪中國各地礦山開採權的鬥爭。十九世紀末，中東鐵路沿線、山東膠濟鐵路沿線、四川、廣西、山西、河南等地的許多重要礦山的開採權已落入帝國主義列強之手。在宣佈實行“新政”後，清政府又一再修訂礦務章程，便利帝國主義掠奪中國礦產資源的活動。帝國主義列強不僅大大加強了爭奪新的礦山開採權的鬥爭，而且多方強奪和兼併中國已有的採礦企業。1901 年，在清朝廷賣國官僚的幫助下，中國最大的也是過去唯一辦得有成效的開平煤礦被英國資本所竊據，自此至 1911 年，井陘、臨城、撫順等重要煤礦也先後落入外國資本之手。外國資本在中國的採礦業中很快地形成了壟斷地位。到 1906 年，外資及中外合資煤礦的投資額在全國煤礦投資總額中的比重已達到 84.8%<sup>②</sup>。

大肆搜括人民，以償付對外國侵略者的戰爭賠款，是清朝統治集團賣國活動的另一項重要內容。中日甲午戰爭後，清朝廷為支付對日賠款，向法、俄、英、德等國資本集團借款達三萬萬兩，每年攤付本息一、二千萬兩，這已使它在財政上拮据不堪。辛丑和約規定的賠款共達四億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攤還，本息累計共達九億八千餘萬兩。為償付這些賠款，清朝廷除舉借外債和發行國內公債外，還採取了清理田賦、丁漕折色、增收鹽酒茶

①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 252 頁。

②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 132 頁表。

煙稅捐、整理房田契稅、開征印花稅等措施，盡力榨取人民大衆的脂膏；各省還實行了濫鑄銅元、濫發官錢票等辦法。這些搜括措施，爲全國人民造成無法忍受的苦難；而清朝廷的財政也更陷於山窮水盡的境地，金融貨幣制度更加混亂。

在清朝廷統治的最後十年間，外國在華經濟侵略勢力有了極大的擴展。1902—1914年，外國在華投資（不包括庚子賠款未付本息）增加了一倍有餘<sup>①</sup>；1901—1911年，外國資本在華所設的較大的工廠（資本在十萬元以上），爲過去六十年開設數目的二倍多，資本額則差不多爲其五倍<sup>②</sup>；1895—1913年，外國在華銀行的分支機構增加了將近三倍，外國輪船在華航行噸位增加了二倍，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增加了二倍半<sup>③</sup>；外國資本控制了中國已設鐵道的絕大部分，並且在中國的一切主要工業部門中取得了壟斷的地位，中國的主要稅收關稅和鹽稅和許多省分的厘金，都被指定專供償還對帝國主義的賠款之用。帝國主義列強已牢牢地控制了中國的國民經濟命脈。

適應這種賣國政策的需要，清朝統治集團的經濟思想也表現了徹底買辦化的特點。清朝的買辦官僚們，一方面杜撰種種“理由”，掩蓋這種政策的賣國實質；另一方面又抓住當時一些商辦鐵路公司中的弱點和弊端，竭力詆毀和反對廣大人民保衛中國路礦權利、反對帝國主義侵奪的愛國正義要求。面對着廣大人民的日益高漲的反侵略、反賣國的憤怒浪潮，這些買辦官僚也

① 吳承明編：《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的投資》，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46 頁。

② 根據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上冊，第 3 頁及第 7—11 頁表中數字計算。

③ 吳承明編：《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的投資》，第 40 頁。

更加打起“愛國”的幌子，不但把清朝廷出賣路礦權利的做法說成是爲了中國的“富強”，而且說成是爲了“保護”利權和“防止”外人攘奪。有的人甚至恬不知恥地把“借債築路”（二十世紀初期清朝廷出賣路權的主要方式）說成是“第一救亡政策”<sup>①</sup>。

帝國主義的加緊侵略和清朝廷的賣國罪行，激起了廣大人民的痛恨和反抗。義和團的鬥爭雖在中外反動勢力共同鎮壓下陷於失敗，但廣大人民的反抗情緒却繼續高漲起來。鬥爭的羣衆越來越認清了清朝廷的賣國反動面貌，因而日益把鬥爭鋒鏑指向清朝廷這一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工具。義和團失敗後不久，其餘部就在景廷賓領導下在直隸（河北）南部豎起了“掃清滅洋”的旗幟，四川的會黨也提出了“滅清剿洋興漢”的鬥爭口號。全國各地區人民，以抗捐、抗稅、搶糧（因商人、官僚、地主等利用災荒囤積米糧）、收回利權和抵制洋貨、反洋教鬥爭和產業工人自發鬥爭等形式，同帝國主義及其卵翼下的清朝統治者展開了日益廣泛、激烈的鬥爭。據有人初步統計，1905年發生的各種反抗鬥爭約計八十八次，1909年增爲一百一十三次，1910年更激增爲二百八十五次<sup>②</sup>。

民族危機的急遽加深和羣衆反抗鬥爭的日益高漲，促進了資產階級中下層和小資產階級人物特別是它們的知識分子的進步，使他們之中的先進分子日益傾向於革命。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初步發展，則爲資產階級革命準備了一定的物質基礎。

帝國主義在華投資的擴張，在迅速造成中國經濟的破產和

① 錫良、瑞澂宣統二年奏。見《東方雜誌》七卷九號《中國時事彙錄》。

② 林增平：《辛亥革命》，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63頁。

殖民地化的同時，也在客觀上對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起着一定的刺激作用；清朝廷爲了增闢稅源以解決其財政困難，特別是爲了分化資產階級以破壞日趨高漲的革命運動，也逐漸對民族資產階級上層作了一些讓步。1903年，清政府成立了資產階級上層人物渴望成立的“商部”，接着陸續頒佈了《獎勵公司章程》、《商會簡明章程》、《接見商會董事章程》、《公司律》、《公司註冊試辦章程》、《華商辦理農工商實業爵賞章程》等一系列規章條令，承認了資產階級發展工商企業的權利，並用封官授爵之類的辦法獎勵投資創辦規模較大的企業。

據初步統計，1895—1900年，全國所設立的廠礦企業共一百零四家，平均每年十七點三家；1901—1911年共設立三百八十六家，平均每年達三十五家<sup>①</sup>。隨着資本主義經濟的初步發展，資產階級作爲一個社會階級也大體形成起來。

在民族資產階級中，從富商、官僚和地主轉化而來的上層人物是這一階級中“同外國資本和本國土地關係較多的一部分人”<sup>②</sup>。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初步發展，首先使這部分人的經濟實力有了相當增長。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清朝廷出賣中國利權的活動，嚴重地阻礙着他們的發展，因而他們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以及清朝廷之間仍有相當的矛盾，在一定時期中，也曾從自己的切身利益出發，參加並領導了爭回築路權利、抵制美貨等鬥爭。但是，即使在被迫參加這些

① 根據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料》，第二輯，下冊，第649頁表中的數字計算。

② 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毛澤東選集》，普及本第一卷，第140頁。

鬥爭時，他們也是極力設法把鬥爭局限於只適合他們自身利益的範圍，阻礙羣衆鬥爭的進一步發展。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較爲密切的關係，決定了他們在政治上自始就比資產階級的其他階層有着更大的妥協性，並具有堅決敵視革命和懼怕羣衆鬥爭的特點。面對着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他們深怕清朝反動統治的倒台會使他們自己的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密切聯系着的利益遭到損失，因而極力設法對抗和破壞革命運動，不惜和反動勢力站在一起來與革命爲敵。這一階層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代表人物——資產階級改良派，是一些在政治上最善於投機和耍弄兩面手法的人物。他們極端仇視革命運動，但在某一反動統治集團的崩潰已不可挽救時，又往往僞裝贊同革命，鑽到革命陣營內部進行破壞，篡奪革命果實，並支持另一反動統治集團來代替面臨崩潰的反動統治集團。

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的情況有所不同，他們中間的許多人與外國資本和本國土地的關係較少，其經濟地位與上層小資產階級較爲接近，其中許多人還是從小資產階級上升而來的。資產階級中下層也有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所具有的兩面性，但它受着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更嚴重壓迫，因而有着較大程度的反帝、反封建的積極性。在十九世紀末，已有以孫中山爲首的少數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先進人物組織了革命團體——興中會——並進行了一些革命活動；二十世紀初期的深重民族危機和羣衆鬥爭的高漲，大大促進了這些階層的覺醒，出現了成批的革命分子，成爲當時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主要領導力量。

1902 和 1903 年，上海及日本東京開始出現了一些有革命色彩的小團體，若干革命分子，特別是陳天華、鄒容、章炳麟等

人，發表論文和小冊子，鼓吹革命，並對資產階級改良派反對革命的主張進行抨擊。湖南、湖北、浙江、江蘇等省的留學生及其它革命分子，創辦了《游學譯編》、《湖北學生界》、《浙江潮》、《蘇報》等刊物，擴大了愛國和革命思想的宣傳陣地。1904年，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相繼出現。1905年，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中的人物，聯合組成了以孫中山為領導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正式政黨——中國同盟會，按照孫中山的倡議制訂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並出刊《民報》，作為機關刊物。

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標志着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開始進入了高潮。這引起了清朝統治集團和敵視革命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人物的極大恐慌。清朝統治者一方面在國內各地以更殘酷的手段鎮壓革命力量，並勾結帝國主義列強，極力驅逐和迫害在日本、越南等地活動的中國革命分子；另一方面又玩弄“籌備立憲”的騙局，妄圖籠絡人心，抵制革命。資產階級改良派則一方面動員他們的報刊瘋狂地攻擊革命；另一方面利用清朝廷宣佈“籌備立憲”的時機，組織力量開展“叩頭請願”式的爭取君主立憲的政治運動，企圖藉以抵制革命運動，並為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爭取一些政治權利。

配合着政治上的鬥爭，資產階級革命派在經濟思想戰線上也進行了兩方面的鬥爭：一方面揭露和抨擊了清朝廷出賣國家利權的罪行，另一方面回擊了資產階級改良派反對革命派土地綱領的謬論。

二十世紀初期，革命派的一些報刊，就發表了若干文章，指陳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危害，認為經濟侵略是帝國主義列強的

“滅國新法”<sup>①</sup>，它比用“刀兵”、“水火”滅人國家還更加慘毒。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必將使中國陷入“其商淒涼，其農憔悴，其土困，其工苦”、“聞其聲則號寒啼飢”、“問其事則鬻兒蕩產”<sup>②</sup>的悲慘境地。它們特別指出了帝國主義掠奪中國鐵路和礦山的危險，認為帝國主義獲得在華築路開礦權利後，不但使中國的“險要產物，無不全失”<sup>③</sup>，而且還會藉口“保護”它們所攘奪到的權利而要求在有關地區駐兵和實行政治控制。這樣，中國就會從喪失路礦權利開始，終至完全變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因此，攘奪路礦權利，乃是帝國主義“滅國之先導”<sup>④</sup>，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之實行，源於路礦”<sup>⑤</sup>。

革命派中有少數人物還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帝國主義殖民掠奪和清朝廷賣國行為之間的關係。他們指出：帝國主義所以暫時保存清朝廷，不過是要“寄權於其政府官吏，……惟所欲為，可以不勞兵而有人國”<sup>⑥</sup>。也即是利用清朝廷作為統治和掠奪中國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清朝廷事實上已經變成了“洋人的朝廷”<sup>⑦</sup>。因此，中國人民不應再對它抱任何幻想，而應奮起推翻它。一些革命派人物依據這種認識發出了革命的號召說：“欲立新國，必自亡舊始。”<sup>⑧</sup>、“欲使中國不亡，惟有一刀兩段，代

① 《銀行鐵道為侵略土地之根據論》。《游學譯編》，第十冊。

② 《國魂篇》。《浙江潮》，第一期，社說。

③ 《為杭紳高爾伊盜賣四府礦產事敬告全浙紳民啓》。《浙江潮》，第八期。

④ 无已：《滇越鐵路贖回之時機及其計劃》。《雲南》，第四號。

⑤ 《為杭紳高爾伊盜賣四府礦產事敬告全浙紳民啓》。《浙江潮》，第八期。

⑥ 《二十世紀之中國》。《國民報》，第一期。

⑦ 陳天華：《猛回頭》。《陳天華集》，民智書局1928年版，第70頁。

⑧ 《亡國篇》。《國民報》，第四期，社說。

滿清執政柄而卵育之。”<sup>①</sup>

認識到清朝廷是帝國主義的統治工具，要擺脫帝國主義統治必須革清朝的命，這是中國人民在長期反帝、反封建鬥爭中在認識方面所取得的一個大進步。但是，革命派對帝國主義的認識，以及對帝國主義及其殖民統治工具——清朝廷——之間的關係的認識，又都是很不足的。他們不懂得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由帝國主義的本性所決定的，而是錯誤地認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完全是由於清朝的不爭氣，因而相信只要推翻清朝廷而代之以共和政府，帝國主義就不會再侵略中國。他們還對帝國主義的經濟“援助”抱有很大幻想。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資產階級革命派沒有提出過反對帝國主義的綱領，在實際鬥爭中也對帝國主義干涉中國革命的活動缺乏警惕和鬥爭勇氣，甚至採取了承認清朝廷與帝國主義所訂不平等條約的極端錯誤的作法。革命派的這些錯誤認識和主張，是資產階級在同帝國主義鬥爭中的怯懦立場的明顯表現。

資產階級革命派和資產階級改良派兩種經濟思想之間的鬥爭，是兩派之間所進行的的大論戰的組成部分。在同盟會成立之前，兩派之間的若干人物已經進行了一些爭論，同盟會成立後，這種爭論迅速達到高潮。爭論的中心主要為要不要反清革命、中國應採行民主共和政體還是君主立憲政體以及要不要改變封建土地制度等三大問題。在最後一個問題上，兩派的爭論實際上不僅限於土地制度本身，也還涉及到其他一些經濟問題。

總起來說，革命派和改良派在經濟思想上的分歧主要發生在下列幾個問題上：

<sup>①</sup> 陳天華：《絕命書》。《陳天華集》，第50頁。



### (1)在土地制度問題上

土地制度問題是兩派經濟思想爭論的核心。革命派提出了“平均地權”的綱領，主張在資產階級共和國成立後征收單一地價稅，並採用土地增價歸公的辦法實現“土地國有”。他們還指責地主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不合理的，是“不勞而獲”，足以阻礙社會進步。改良派堅決反對革命派的土地國有主張，提出了種種謬論為中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辯護。

### (2)在發展實業問題上

革命派及改良派都認為中國應建立和發展以大機器工業為中心的工商“實業”。但是，革命派在積極主張發展大機器工業的同時，還希望能夠“避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那種貧富嚴重分化和階級鬥爭日趨尖銳的後果，因而主張用土地國有和大企業國有的辦法來“防止”資本家壟斷。改良派則強調由私人資本家集股設立大公司來“振興實業”。它的一些代表人物還鼓吹大資本家利益高於一切的論調，公然主張應犧牲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來加速增殖大資本家的財富，有的甚至還大肆歌頌外國壟斷寡頭並讚揚各種投機欺詐活動。

### (3)在發展經濟的政治前提問題上

革命派認為必須由革命後建立的“民國”來實行“平均地權”和組織大實業，也即以推翻清朝封建政權和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作為發展經濟的前提。改良派也說要以“改良政治”作為發展實業的前提，但他們堅決反對通過革命來實行政治改革，而只是主張用請願和其他“合法”的手段來要求清朝廷實行君主立憲。

革命派和改良派在思想方面的這些分歧，就其性質說，是財力比較雄厚並擁有較多封建土地利益的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和